

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¹⁾

张 森 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关键词 旧石器时代晚期;区域性文化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我国南方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资料作一简要总结,并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有较悠久的历史。自1913年起,埃德加(Edgar)在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省)和湖北省寻找石器时代遗物,在其所采集的标本中,可能有旧石器。1931年鲍勒斯(Bowles)也曾在川西做过工作。1935年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和杨钟健在四川万县曾发现过石片。同年,裴文中在广西发现了可能是中石器时代的遗物。1937年卞美年在云南邱北黑青龙村的一岩厦内的堆积物中发现了用火遗迹和两件石片,并认为其时代早于桂林的发现。但限于条件,解放前的成果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南方开展广泛的旧石器文化的考察,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地点,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以晚期者最为显著。虽然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对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进行系统的总结是有困难的,但对这一广大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作一简要的总结是有条件的。继往开来,似有必要,也是有益的。

一、主要的成果和研究的现状

在我国南方已发现含智人化石或旧石器文化遗物或遗迹的地点59处,其中河南、湖南、江苏、浙江和江西省各有1个地点,湖北省有2个地点,台湾省有4个地点,四川省有6处,贵州省有7处,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6处和云南省有19处(图1)。属于本研究区的安徽、福建和广东省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料。

各地点发现的材料多寡不一,文化内涵亦有差异,加以归纳,大体可分7类:1.在同一地点内既发现人化石、又有石器、骨器和角制品者有4个地点;2.人化石和石器共存仅有2个地点;3.只发现智人化石的地点10处;4.仅发现石器的地点共38处;5.石器和骨、角器共存者仅2个地点;6.石器和装饰品一起出土者亦只有1处;7.只发现骨器或角

1) 本文所说的我国南方是指东经100°—122°,北纬22°—33°的广大地区。西藏因地理位置特殊,暂不包括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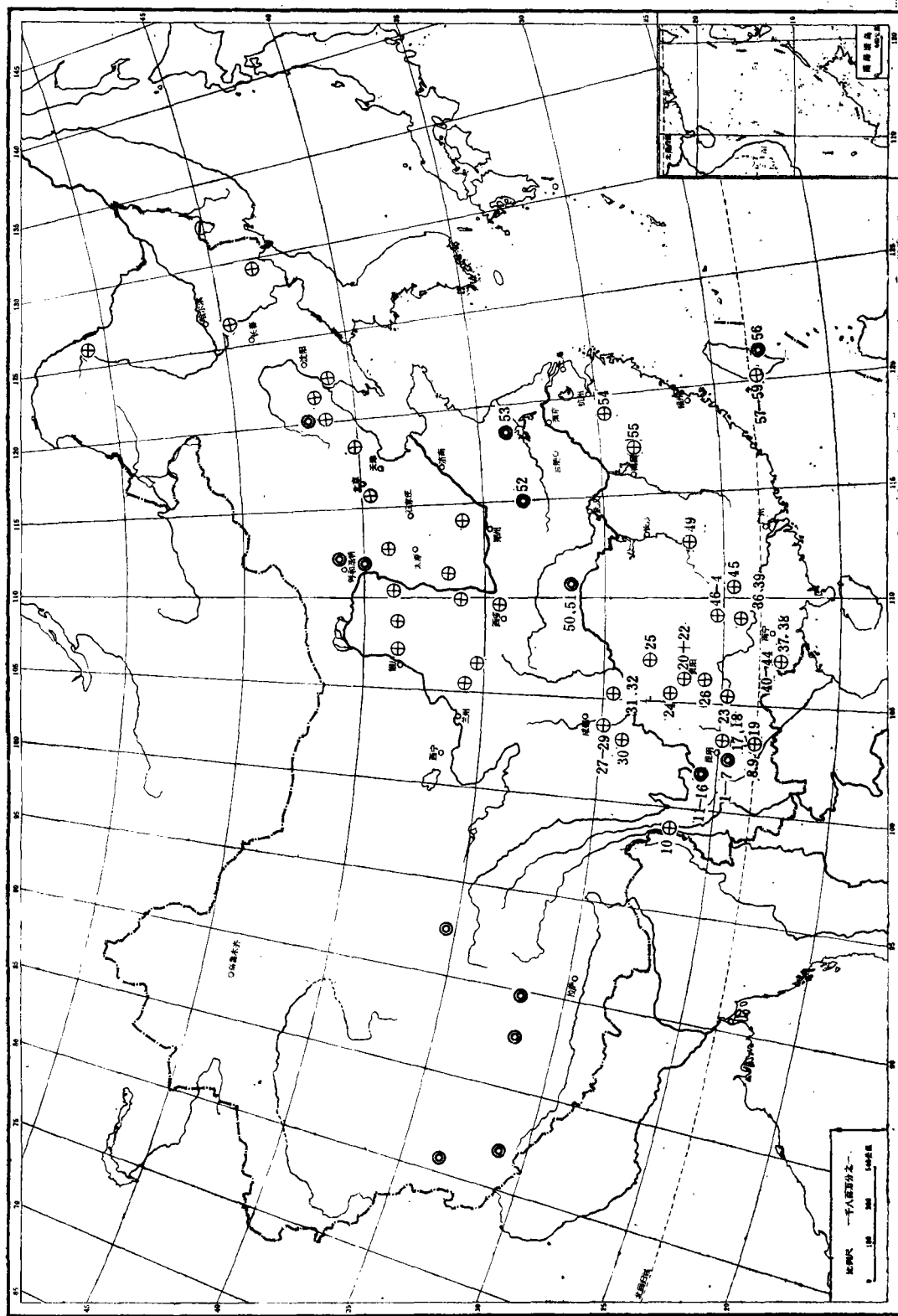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南方晚期旧石器地点分布图

制品者有 2 个地点(表 1)。

在本区已发现的智人化石,依初步统计:有头骨 4 件、上颌骨 2 件、下颌骨 5 件、单个牙齿 18 枚、股骨 6 件、顶骨 1 小块和其他体骨多件。依人类学家的研究,其形态特征,尽管或多或少保留着原始性,但基本上具有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有些可能稍原始一些,例如“柳江人为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吴,1959)。

在 49 个含文化遗物的地点中,只有几个地点是含文化遗物丰富的或比较丰富的,如富林遗址、铜梁地点、猫猫洞和穿洞遗址等。台湾省台东县潮音洞出土物也很丰富,其余的多为零星采集,少则仅 1 件石器,多则有 10 或 10 余件,个别的可超过百件。在我国南方,已发现有火遗迹的地点 9 处,有骨器及角制品的地点 8 处,后者多数地点只有 1 件标本,最丰富者则数以百计。

如上所述,在我国南方研究工作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就地区论,广东、福建和安徽是空白区,浙江、江苏、河南、湖南等省可以说是基本空白区,湖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研究工作也是曙光初露,本区其他各省情况稍好,但分布区相当不平衡;从研究工作重要性来看,材料丰富的遗址寥寥无几;最薄弱的环节是缺乏可靠的断代资料,绝大多数地点未做或无法做年代的测试,亦缺相对年代的资料,已做过 C¹⁴ 或铀子系法年龄测定的只有猫猫洞等 5 个地点,显然这方面工作亟待加强,因之,目前也无法排出不同地点的时间序列。

二、原始技术的概述和工业的一般性质

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制作石器的技术方面显示出多样性。如果将其所处的时代和国内、外旧石器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起来考虑,其特点是鲜明的,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在打片方面曾用四种方法:锤击法、锐稜砸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这四种方法都是直接打法,至今未见使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起来的击棒法(Punched technique)和压制技术(Pressured technique)来生产石片,也未发现长石片、石叶及与其相应的柱状、锥状和楔状石核。

以锤击法生产石片而论,很少或基本上不修理台面和石核体;在打片中常采用转向打法,从而使石核和石片的形制多不规整。石核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且比较短宽,常常是宽度大于长度,其厚度相当大,往往与长度相仿。若是单台面石核基本上不改变砾石的原貌,其上石片疤也不多,这表明石核的利用率不高;另外,石核多自然台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石片的生产率。石片缺乏相对稳定的形态,多长大于宽,但长宽比差超过一倍的标本很少,也有一部份石片是宽大于长的。总的说来,石片长度稍大于宽度,其长宽指数¹⁾都在 80 以上。

从各地点出土的石片来看,不同地点的远古居民所采用的打片方法各有侧重。锤击法是普遍应用的方法,绝大多数地点的远古居民以它作为主要打片方法,只有猫猫洞文化

1) 长宽指数 = $\frac{\text{宽}}{\text{长}} \times 100$ 。

表 1 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发现情况

地点 编号	地 点 名 称	发现或发 掘 时 间	发 现 者 或 研 究 者	材 料 摘 要	发 现 情 况	遗 址 类 型	文 化 遗 物 分 类 编 号
1	云南路南县山(三)冲	1961.1	裴文中、周明镇等	几件石片	地表采集	旷野	4
2	云南路南县安仁村	1961.1	裴文中、周明镇等	20 多件石片和石核	地表采集	旷野	4
3*	云南路南县板桥白石岭	1961.1	裴文中、周明镇等	加工精致的半月形刮削器 1 件等	地表采集	旷野	4
4	云南路南县板桥青山口	1961.3	李炎贤、黄慰文	刮削器 1 件	地表采集	旷野	4
5	云南路南县板桥小野马群	1961.3	李炎贤、黄慰文	20 多件石器	地表采集	旷野	4
6	云南路南县红土坡	1961.3	李炎贤、黄慰文	一些石器	地表采集	旷野	4
7	云南路南县羊角基村北	1961.3	李炎贤、黄慰文	几件石器	地表采集	旷野	4
8	云南西畴县仙人洞	1965、1973 等	袁振新、陈德珍等	5 枚人牙化石和 32 种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3
9	云南马关县龙口洞	1973 冬	袁振新、陈德珍等	2 件石器和 18 种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4
10	云南丽江县木家桥	1960、1965 等	林一璞、李有恒等	人头骨 1 件、股骨 3 件、石器 6 件 和动物化石等	产自地层	旷野	1
11	云南元谋县野龙村	1971.	尤玉柱、潘悦蓉	石器 2 件	地表采集	旷野	4
12*	云南元谋县四家村	1973.10—12	文 亨	石器 30 多件	部分地表采集	旷野	4
13	云南元谋县下棋柳	1973.10—12	文 亨	一些石器	地表采集	旷野	4
14	云南元谋县新村	1973.10—12	文 亨	几件石器	地表采集	旷野	4
15	云南元谋县火车站	1973.10—12	文 亨	一些石器	地表采集	旷野	4
16	云南元谋县老鸡塘	1973.10—12	文 亨	砍砸器 1 件	地表采集	旷野	4
17	云南呈贡县龙潭山	1975.2	胡 绍 楠	一些石器和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4
18	云南呈贡县龙潭山一号洞	1975.2 和 7	胡绍楠、张兴永	人牙化石 2 件、10 种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3
19	云南邱北县黑箐龙村	1937.4	卞美年、贾兰坡	石片 2 件、用火遗迹及一些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4
20	贵州普定县穿洞	1979.6、1981.6	曹泽田、张森水等	许多石器、骨器、用火遗迹及一些化石	产自地层	岩厦	1
21	贵州普定县白岩脚洞	1978.7	秦启万、蔡回阳	许多石器、几件装饰品、用火遗迹	产自地层	洞穴	6
22	贵州普定县双山红土洞	1979.7、1981.7	曹泽田、张森水等	一些石器和角器	产自地层	洞穴	5
23	贵州兴义县猫猫洞	1974. 冬、1975	曹泽田 等	许多石器、一些骨器、人化石、用火遗迹	产自地层	岩厦	1
24	贵州纳金县大岩洞	1977.4、1978.1	曹泽田、张森水	几十件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4
25	贵州福梓县马鞍山	1980、1981.4	张森水、曹泽田	约有 200 件石器和用火遗迹等	产自地层	岩厦	4
26	贵州长顺县威远	1976	曹 泽 田	一些石器	产自地层	岩厦	4
27	四川资阳县黄麟溪	1951.9、1981.4	裴文中、张森水	人头骨化石、骨髓、一些石器和动物化石	地表采集	旷野	1
28	四川资阳县石虾子河	1973.5	李宜民等	几件石器	产自地层	旷野	4
29	四川资阳县鲤鱼桥	1974.	秦学圣等	一些石器	产自地层	旷野	4

30	四川汉源县富林镇	1961, 1972. 10	杨玲, 张森水等	几千件石器, 用火遗迹及少量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野旷	4
31	四川铜梁县张二塘	1976, 1978	李宜民, 张森水	300 多件石器和 10 种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旷野	4
32	四川蓬溪县鄞口	1973. 5	李 宣 民	石器 2 件和中国犀等化石	产自地层	旷野	4
33	广西来宾县麒麟山	1956. 1	贾兰坡, 吴汝康	残破的人头骨化石和几件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2
34	广西柳州市白莲洞	1956. 1	贾兰坡, 邱中郎	一些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4
35	广西柳州市多思洞	1956. 1	贾兰坡, 邱中郎	一些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4
36	广西柳州市都乐岩	1974 夏	易 光 远	人乳齿化石和股骨化石各 1 件	产自地层	洞穴	3
37	广西崇左县矮洞	1956. 1	贾兰坡, 邱中郎	一些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4
38	广西崇左县陈家岩	1956. 1	贾兰坡, 邱中郎	一些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4
39	广西柳江县通天岩	1958. 9	吴汝康等	人头骨、股骨、部份体骨及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3
40	广西百色县上宋村	1973. 10	李炎贤, 尤玉柱等	石器 11 件	大部产自地层	洞穴	4
41*	广西东安县长蛇岭	1979. 6	覃圣敏, 覃彩奎	石器 106 件	地表采集	旷野	4
42	广西东安县洽塘村	1979. 6	覃圣敏, 覃彩奎	石器 31 件	地表采集	旷野	4
43	广西都安县干庵岩	1972 冬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牙化石 2 件	产自地层	洞穴	3
44	广西都安县久楞岩	1978. 1	王令红等	人牙化石 4 件和一些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3
45	广西荔浦县水岩东洞	1961. 11	吴新智等	人牙化石 1 件等	产自地层	洞穴	3
46	广西桂林市穿山月岩	1961. 11	吴新智等	几件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4
47	广西桂林市北门四号洞	1934. 1	裴文中	几件石器	产自地层	洞穴	4
48	广西桂林市宝积岩	1979. 7	王令红等	人牙化石 2 件、石器 12 件、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2
49	湖南岳阳一洞穴	1964	张森水等	骨锥 1 件	产自地层	洞穴	7
50	湖北房县文峰塔	1976. 12	袁振新、周国兴	一些石器	产自地层	旷野	4
51	湖北房县莲花湾	1977	周国兴	一些石器	地表采集	旷野	4
52	河南新蔡县诸神庙	1955	裴文中	有割刺痕迹的鹿角 1 件	地表采集	旷野	7
53	江苏泗洪县下草湾	1954. 6	吴汝康, 贾兰坡	人股骨化石 1 件	地表采集	旷野	3
54	浙江建德县乌龟洞	1974. 12	韩德芬, 张森水等	人犬齿化石 1 件、16 种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3
55	江西乐平县涌山洞	1962. 11	黄万波, 计宏祥	几件石片和 7 种动物化石	产自地层	洞穴	4
56	台湾台南县菜寮溪	1970	林朝棨	人顶骨化石 1 小块	地表采集	旷野	3
57	台湾台东县乾元洞	1969. 1-2	宋文薰, 林朝棨	石器 20 多件	产自地层	洞穴	4
58	台湾台东县海雷洞	1969. 1-2	宋文薰, 林朝棨	石器 100 多件	产自地层	洞穴	4
59 ⁴	台湾台东县潮音洞	1969. 1-2	宋文薰, 林朝棨	石器约 3000 件、骨器 100 多件	产自地层	洞穴	4

* 3 号地点有 1 件, 12 号地点有部份石器和 41 号地点有 4 件标本产自地层中。

⁴ 此地点未发现陶片和磨光石器, 其文化面貌有些象磁器洞, 但 C¹⁴ 年代很晚, 最早的数据为 5370±260 B. P. 原作者对此数据有疑, 它可能归于文化发展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或中石器时代文化, 是原始社会早期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有意义的例证, 故予以备考。

和穿洞上部文化是个例外,它们的文化创造者以锐稜砸击法为其主要打片方法,并以锤击法为其辅助的打片方法;用砸击法打片只见于几个地点,且均居很次要的地位,基本上见于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中,碰砧法偶被用于打片,只见于铜梁地点和猫猫洞遗址出土的石片中。由此可知,它总是与以大、中型石器为主的文化相联系。

2. 从总体上看,石片工具占多数,是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工业,但石核工具仍占相当比例,百色盆地出土的石工具¹⁾大多数是砾石和石核做的。另依有统计数字的资料,石核工具占比例最高的(占石工具总数的 54%)是富林文化,最低的是猫猫洞文化,占 17.3%。

3. 石工具分两大类: 第一类与制作工具有关的石工具——砸击石锤、石砧、锐稜砸击石锤和锤击石锤,将广西等地常见的打击砾石暂归此类中;第二类石工具主要是指加工生活资料的工具——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少量的雕刻器。至今未发现石锥、石镞和石球等工具,显示出其第二类工具类型简单的特点。

在绝大多数地点出土的第二类石工具中,刮削器是占绝对优势的类型。尖状器虽然在数量上比刮削器少得多,但修理多较好,是重要的工具类型。砍砸器在多数地点出土的工具中普遍占有较高的比例,其中占比例较低的是猫猫洞遗址,占第二类石工具的 8.1%,在元谋地区采集品中,它占 17%,铜梁者占 33%,新州采集品中它占 54%,呈贡县发现的已报道的石工具 8 件,原作者认为有刮削器和砍砸器各 4 件。这一特点与华北同期重要地点的工具组则迥然不同。例如水洞沟出土的砍砸器约占工具总数²⁾的 2%,甘肃环县刘家岔占 0.8%,山西的下川文化约占 0.5%,甘肃泾川南峪沟和桃山嘴、内蒙乌审旗大沟湾一带(萨拉乌苏)没有发现砍砸器,山西朔县峙峪和河南安阳小南海提到有砍砸器,数量不多(峙峪 1 件,小南海 4 件),但体积很小,重量轻,失去了砍砸器的本来意义。雕刻器很少,基本上见于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中。

4. 第二类石工具的修理多用锤击法,未见采用压制修理的标本。用锤击法修理工具的方式是多样的: 有向背面、向破裂面、复向和错向加工的,基本上不用交互打击法修理石工具。但各地点的原始居民所采用的修理方式亦各有侧重。向背面修理虽然应用普遍,但只是在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中居主要地位,在以大、中型的石器为主的文化中则居次要地位;向破裂面和复向加工则分别是猫猫洞文化类型和铜梁文化的第二类石工具的主要加工方式;用错向加工方式修理成的标本不多,各重要地点均有发现,但均居很次要的地位。

由于使用上述的加工方式方法,影响其最终产品。我国南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第二类石工具形制多不规整,显得“个性”强,刃缘曲折和刃口上小石片疤深凹者习见,刃口钝锐均有,缺乏相对的稳定性。总之,其第二步加工给人的印象相当粗糙。

5. 这个地区石器大小相差悬殊,但其长宽比差基本一致,都是沿着等比方向变大或小型化的,其长宽指数在 70 左右,这与华北某些地点的工具变化倾向是不一样的,例如水洞沟和下川地点群的石器是沿着长宽不等比细化方向发展的,其长宽指数在 40 以下。两者所使用的加工技术也是不同的,前者均用直接打法,后者部份地采用间接打法和压制技术。

1) 这里用石工具一词,以区别这个时代出现的磨制的骨、角工具。

2) 依 1963 年的发掘资料。

6. 在一些地点发现了磨制的或刮制的骨器和角器。骨器的类型有: 骨锥、骨铲、骨刀、骨针(?) , 还有用途不明的、尾部带叉的扁骨器和扁平无刃骨器; 角器仅有角铲一种。此外, 还有数以百计的、属多种类型的打击骨器, 其中一部份可能是磨制骨器的毛胚。

7. 这个地区发现的装饰品和艺术品很少, 成型的艺术品至今没有找到。

从上面对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的总述和其一般性质的略论可以看出, 此时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既有继承性的一面, 又有特殊性和发展性的一面。从石器性质来看, 比华北同时代文化要显得原始; 从骨、角器上看, 其文化上的进步, 在这方面比华北显著。这可能说明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工业的重心转移, 由着眼于改进石器技术和创造新类型而转向发展骨、角器工业; 其二可能是优越的自然条件, 生活资料不难得到, 对改进石工具没有那么迫切。存在较多的砍砸器, 暗示砍伐树木等用途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关于区域性文化问题及其成因的探讨

在以往的我国旧石器文化的文献中, 某一旧石器文化常指空间的某一点, 几乎没有涉及到面(分布区), 这里所说的区域性文化是指有一定分布区的某一旧石器文化类型, 着眼于其在空间的分布。其实考古“文化”一词本来就包含区域分布, 在此, 只是根据旧石器研究的现状, 故用“区域性文化”这一术语。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确定一区域性文化时, 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对比原则:

1. 打片方法的种类及其主要打片方法; 2. 毛胚的种类及主要毛胚; 3. 石工具的类型及其主次; 4. 石工具的大小及主要倾向; 5. 石工具的修理的方式方法及其主要的方式方法; 6. 是否存在骨和角器、装饰品以及艺术品等。这里着重强调主要方面, 是从定量分析入手, 突出重点, 以减少或避免打击石器中的偶然因素。以上各点有一点以上相同者可归于同一区域性文化(或同一文化类型), 反之, 属不同的区域性文化。依据上述原则, 在我国南方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区域性文化。

富林文化 富林文化已知分布区在大渡河沿岸, 典型地点在四川汉源县富林镇(E. $102^{\circ}42'$, N. $29^{\circ}20'$), 其最重要特点有: 1. 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和第二类石工具) 非常小, 长度很少超过 30 毫米, 锤击石片平均长度为 14.9 毫米, 刮削器(包括端刃刮削器) 平均长度为 26.9 毫米, 是至今所知我国南方旧石器中尺寸最小的, 即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其石工具的毛胚用小石块和小石核制成者占 56%, 石片工具只占 42%, 少数毛胚性质难定。此外, 其主要用锤击法生产石片, 辅以砸击法, 石片和石核形制多不规整, 石工具类型简单, 主要是刮削器、次为尖状器, 雕刻器少而且多不典型, 砍砸器仅 1 件, 没有发现骨、角器和其他遗物; 修理石工具以向背面加工为主, 也有向破裂面、错向和复向加工的, 不用交互打击法修理石工具, 以上各点亦是富林文化的特点。

铜梁文化 铜梁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四川铜梁县西郊(E. $106^{\circ}02'$, N. $29^{\circ}56'$) 而得名。依目前所知, 它分布于涪江和沱江河谷区, 东起铜梁, 西至资阳的一种区域性文化。铜梁地点含旧石器地层的时代, 依同层出土的木化石和核桃壳做 C^{14} 年代测定, 其年龄分别为距今 23550 ± 310 年或 27450 ± 850 年。

铜梁文化的特点如下:

打片主要用锤击法,次为碰砧法。无论是石片或石核,其形制原始,大小相差悬殊,但以大、中型者居多,且较短宽,石核长宽指数为132,石片为84。石片边缘常见个别打击痕迹,缺乏完整的、锋利的边缘是其重要特点。

铜梁文化以石片工具为主,占63.6%,石核工具占36.3%。在石片工具中有6.2%的标本是用碰砧石片做的,这是我国南方旧石器资料中前无记录的。

石工具类型简单,刮削器是其主要类型,次为砍砸器,占33.2%,而尖状器居末位,只占15%。在铜梁工具组合中砍砸器占比例之大,在我国南方仅次于百色盆地的采集品和时代稍早的大冶石龙头的工具组合,居第三位;就全国范围而论,也只低于襄汾丁村工具组合和河南三门峡的采集品。在砍砸器中,端刃砍砸器占砍砸器的1/3,这是国内任何地点工具组合所没有的。

其石工具多粗大而厚重,长在60毫米以上的大型者占57.1%,而长度在40毫米以下的小型石工具只占11%。由此可见,在其工具组合中大、中型石工具占压倒优势。

在工具组合中,复刃工具多于单刃工具,前者占71.8%,后者占28.2%。此特点未能在国内同时期文化中找到对比资料;若不限于时代,也只有观音洞出土的石工具可与其相比。

在铜梁文化中,石工具修理方法基本上用锤击法,偶用碰砧法(仅有3件标本),后者只见于中国猿人遗址下部地层出土的砍砸器中,国内再无可靠的对比资料。

复向加工是其主要修理方式,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特征。此外,也采用向背面加工,向破裂面修理和错向加工,基本上不用交互打击法。

从石工具上可以看到相当粗糙的修理工作,刃口上小石片疤凹凸不平,刃缘曲折,显得与其时代很不相称。在修理石工具时,远古的铜梁居民常用陡向加工,刃口很钝,刃角常超过 80° ,这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猫猫洞文化 猫猫洞文化的典型遗址位于贵州兴义市猫猫山东侧一岩厦内(E. $105^{\circ}01'$, N. $25^{\circ}12'$),用同层出土的鹿牙化石做铀子系法年龄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14600 ± 1200 年。与其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材料相当丰富的还有贵州普定县穿洞遗址的上部文化层。由此可知,这种区域性文化已知分布区是黔西南,其特点如下:

打片主要用锐稜砸击法,用此法生产的石片和打片后留下来的石核占可分类的石器总数的66%,而锤击石片和石核只占12.9%¹⁾,表明锤击法居次要地位。

石片工具占比例很高,占石工具总数的82.7%,其中有79.5%是用锐稜砸击石片做的,这一点为别的旧石器文化所不具有。

其修理石工具的方式与国内习见的主要方式不同,绝大多数是向破裂面加工的,占石工具的总数的85.2%。

石片或石工具都比较大而薄,长度多在60毫米以上;其石工具修理多较精致或相当精致,类型稳定,其中尤以单凸刃刮削器和尖状器最为规整;石工具的刃口多平整而锐利,刃角多在 60° 左右,钝刃(刃角超过 80°)者只占3.2%。

存在磨制的或刮制的、造型精美的多种骨、角器也是其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1) 这两个百分比都把已制成石工具的锐稜砸击石片和锤击石片分别计算在各自的百分比中。

百色盆地的石器 百色盆地的石器已记述者仅 3 个地点：上宋村、治塘村和长蛇岭，分布于右江两岸的第二和第三级阶地上，绝大多数是地表采集品。其石器别具一格，十分粗大，大多数石工具是用整块砾石做的砍砸器，其中以单面加工的尖刃砍砸器最具区域性色彩；小型的石片工具很少，仅有几件刮削器。各类石工具加工均很粗糙，刃缘多较曲折。这样特点的石工具为同时代所未见，显示出其区域性文化的特点。限于材料多采自地表，暂不命名。

元谋—宜良(路南)的石器 这一小区的石器主要来自三个县，即元谋、路南和呈贡县的 15 地点，大多数地点的石器采自地表，数量也很有限，只有个别地点出自地层，但这些地点的石器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

打片用锤击法。石片和石核均较大，且多短宽，宽大于长的石片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工具大小均有，类型简单，主要是刮削器，其次为尖状器，砍砸器极少，别无其他类型见于记述。石工具以大、中型者居多，且主要是向背面加工的，也有一些向破裂面、错向和复向加工的。尽管它们仍有些共同点，因其研究情况与百色相仿，故也暂不命名。

在贵州和湖北等省发现了一些以小石器为主的地点，但其中包含一些大的石器，如大的石片和砍砸器等，其中偶然还发现过骨制品，如贵州桐梓马鞍山地点。其石器的主要方面是接近富林文化的，但也存在少许差异。看来，随着将来工作的深入，富林文化类型尚可再划分成若干个文化变体 (Variety)。

在我国南方存在多种区域性文化，究其成因，依笔者揣测可能与地理环境和氏族形成有关。我国南方有高山、丘陵和平原，多样的地形会给古人类生产带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在旧石器时代可能是微弱的)反映到生产工具的成份上来。从塔斯马尼亚人的部落有固定的迁移区和狩猎区，以及塔斯马尼亚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工具的制造由成年男子来承担等民族学资料来分析，我国南方多种区域性文化的出现可能与氏族形成关系更为密切，地理因素和氏族形成对区域性文化的出现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地理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的交流，氏族的初步发展，使以自然地理为界的固定活动区日渐建立，久而久之，势必导致区域性文化的萌发和发展，因之，氏族的形成在这方面可能是起着主导作用。

四、各地点的文化关系及工业发展的趋势

为了便于讨论各地点(或地点群)的文化关系，把各地点的工具及加工的方式方法列一简表(表 2)，以资对比。从表 2 可以看出，各主要地点或区域性文化都有一定的相似成份。元谋—宜良的石器与铜梁文化有较多的相似性，较之于其他区域性文化，两者在文化上似较密切。

如上所述，四川境内的富林文化与铜梁文化，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类似富林文化的，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的若干特点：如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兼用砸击法，石器很小，类型简单，砍砸器作用很微弱，骨、角器极少以及石工具沿着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等方面，见于华北一些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的石器中，如内蒙的萨拉乌苏、山西的峙峪和甘肃庆阳的楼房子、桃山嘴等。富林文化显示出与华北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很

表 2 几个重要地点(或地点群)石器、骨器和角器类型以及石器生产方式方法的对比

项目	地点		富林	铜梁	猫洞	穿洞	宜良一元谋	百色盆地	
	主要	次要							
打片方法	锤击法	主要	主要	主要	次要	上部次要, 下部主要	基本	主要	
	砸击法	次要	无	无	无	上部无, 下部次要	无	无	
	砸砧法	无	次要	偶然使用	无	无	无	可能有	
	锐棱砸击法	无	无	主要	上部主要, 下部无	无	无	无	
石片和石核的主体		基本上是小型的	基本上是大、中型的	基本上是大、中型的	基本上是大、中型的	上部以大、中型为主, 下部小型	以大、中型为主	以大型为主	
	第一类石工具	石核工具稍多	以石片工具为主	以石片工具为主	以石片工具为主	以石片工具为主	以石片工具为主	以砾石工具为主	
		砸击石砧	1 件	无	较多(15件)	无	无	无	无
		砸击石锤	2 件	无	少量(9件)	很少	很少	无	无
锤击石锤		很少(4件)	很少(5件)	很少(5件)	很少	很少	无	无	
第二类石工具	锐棱砸击石锤	无	无	相当多(51件)	上部稍多, 下部无	上部稍多, 下部无	无	无	
	打击砾石	无	无	相当多(66件)	很少	很少	无	无	
	刮削器	主要	主要	主要	主要	主要	主要	次要	
	尖状器	次要(居第二位)	次要(居第三位)	次要(居第二位)	次要	次要	次要	很次要	
锤击加工方式	砍砸器	只有1件	次要(居第二位)	次要(居第三位)	次要(居第三位)	上部次要, 下部无	更次要	主要	
	雕刻器	少量(7件)	基本缺失	只有1件	只有1件	基本缺失	无	无	
	向背面加工	主要	次要	次要	次要	基本缺失	主要	主要	
	向破裂面加工	次要	更次要	主要	主要	上部次要, 下部主要	很少	可能有	
交互打击	错向加工	更次要	少量	更次要	更次要	上部主要, 下部很少	很少	无	
	复向加工	极少	主要	更次要	更次要	很少	很少	可能有	
	交互打击	无	基本缺失	少量(7件)	少量(7件)	无	无	很少	
	砸砧加工	无	很少(3件)	无	无	无	无	很次要	
骨器		无	无	有	有	很多(已有几百件)	无	无	
	角器	无	无	有	有	很少	无	无	

有意义的,也是值得今后工作中重视的。

在广西山洞中采到的打击砾石见于猫猫洞文化中,台湾省台东县潮音洞等地点出土的石器以锐稜砸击法为主与猫猫洞的主要打片方法一致,似可认为,它们在文化上有较密切的关系。

贵州普定穿洞文化遗址 (E. 105°45', N. 28°18') 的发现,为探讨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依 1981 年发掘的结果,已挖部份,堆积物可分 10 层,依文化遗物可分上、下两个文化带,其主要差别如下:

上文化带 石器多而大,打片主要用锐稜砸击法,修理石工具主要是向破裂面加工的,骨器数量多,类型也较复杂,还有少量的角制品。

下文化带 石器少而小,打片主要用锤击法,修理石工具主要向背面加工,骨器少,类型简单,无角制品。

由以上各重要的不同点显示出从早期到晚期石器有由小变大的趋势;在打片方法上,由以锤击法为主代之以锐稜砸击法为主,在修理石工具方面,以向破裂面加工为主要方式取代了以向背面修理为主的加工方式;骨器有明显增加的现象。穿洞文化综合体 (Complex) 的文化发展趋势与华北同期旧石器文化发展趋势是不同的。此时的华北旧石器文化在石器方面,虽有沿着长、宽等比小型化或长、宽不等比细化方向发展之别,但都是变小的;至于骨器,至今未能见到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所发展,只有很少的几个地点发现骨器,其发现寥若晨星,仅 1 或 2 件。

邱中郎同志校阅了全文,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谨此致谢。

(1982 年 11 月 2 日收稿)

参 考 文 献

- 文本亨, 1978。云南元谋盆地发现的旧石器。古人类论文集, 126—133。
 王建等, 1978。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 (3): 259—288。
 安志敏, 1969。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 (1): 1—27。
 宋文薰, 1969。长滨文化——台湾首次发现先陶文化(简报)。中国民族通讯, (9): 1—27。
 李炎贤等, 1962。云南宜良旧石器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6: 182—189。
 李炎贤等, 1974。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2: 139—157。
 吴汝康, 1959。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 97—104。
 李宣民等, 1981。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 359—371。
 张映文等, 1981。甘肃泾川南峪口与桃山嘴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考古与文物, (2): 1—4。
 张森水, 1977。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 15—27。
 贾兰坡等, 1960。广西洞穴中打击石器的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2: 64—68。
 贾兰坡等, 1972。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 39—58。
 胡绍锦, 1977。云南呈贡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 225—228。
 曹泽田, 1982。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20: 155—164。
 裴文中等, 1958。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谢骏义等, 1977。甘肃庆阳地区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 211—222。
 Bien, M. N. and L. P. Chia, 1938. Cave and rock Shelter deposits in Yunnan. *Bull. Geol. Soc. China*, 18: 325—347。
 Boule, M. et al., 1928.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 L'inst. Paléont. Hum.*, 4。
 Graham, D., 1935. Implements of prehistoric man in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West China Bor. Res. Soc.*, 7: 47—56。
 Pei, W. C., 1935. On a mesolithic (?) industry of the cave of Kwangsi. *Bull. Geol. Soc. China*, 14: 393—408。

ON SOME PROBLEMS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Zhang Senshu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Key words Upper palaeolithic; Local culture

Summary

The palaeolithic research of southern China has been done for a long time. Some archaeologists and palaeontologists made efforts in the survey of the prehistoric materials. In 1913, J. Edgar began to gather stone tools in Hubei and Sichuan Provinces. In 1930s, Prof. Pei and others worked in Sichuan and other provinces such as Guangxi and Yunnan in the field of Cainozoic research and they paid attention to the palaeolithic artifacts and found prehistoric materials in this region. Dr. G. Bowles had studied prehistoric materials too.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scoveries made in the extensive field in southern China led to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conditions of this region. Therefore, a brief review of the materials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southern China is made by the author and some questions are raised about it in this paper.

1. Main results

About 60 sites bearing the materials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r human fossils (*Homo sapiens*) in southern China have been reported. The sites spreaded in a wide area from 100°—122° E. to 22°—33° N. (Fig. 1). The interesting industries in this region are found from Fulin, Tonglian, Maomaodong and Chaungdong sites etc., and altogether over 10,000 pieces of artifacts have been found. Some bone tools, several antler implements and the remains of used fire as well as some human fossils have also been collected in this region (Table 1).

2. General characters of the industry

(1) The flakes are produced by four flaking methods which are all direct percussion, so most of flakes and cores are various in shape. So far blades, micro-blades and micro-cores made by punch and pressure have not been found.

(2) The stone tools made from the flakes are more than those from the cores. The assemblage consists of three main types: scraper, point and chopper. In addition, a few pieces of the grater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most of them are atypical. Among them the chopper has a larger numbers in proportion compared with contemporaneous industries of northern China.

(3) The stone tools are retouched by direct percussion, therefore, most of them are rather rough. Up till now, no specimens trimmed by pressure have been observed.

(4) Some bone and antler tools worked by scraping and polishing have been gathered in this region.

The characters mentioned above indicate particularity, success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alaeolithic culture known in China.

3.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local culture

In view of typology and technology, there are several local cultures such as Fulin Culture, Tonglian Culture and Maomaodong Culture. Besides, the artifacts picked up from Guangxi and Yunnan may also represent several local cultures. Its distribution is limited in certain region.

4. Industrial developmental tendency and cultural relation among different sit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fragmentary materials found from some sites in Yunnan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Tonglian Culture according to type and technique, while the artifacts from the cave sites in Guangxi can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Maomaodong Culture. Besides, the assemblage in which small tools are more than large ones spreads in an extensive area of southern China and this industry is more close to the tradition in north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s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found in Guizhou recently, the stone tools may be from small to large in size, and the bone tools and antler implement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quantity from early stage to late stage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age. At the present time this question can not yet be answered whether these tendencie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re applied to all conditions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southern China.